

剪双页

苏共领导同我們 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杂志編輯部



蘇共領導同我們 分歧的由來和发展

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雜志編輯部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苏共领导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发展
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 · 字数 34,000

1963年9月第1版

196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754 定价 (四) 0.19 元

声 明

今年七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封給苏联各級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在七月十九日的声明中指出，“苏共中央这封公开信是对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的評价。中共中央认为，这封信的內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評論。”

人民日报和中国其他全国性报纸以及所有省、市级报纸，已經在七月二十日全文刊載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国的广播电台也全文广播了这封公开信。

自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以后，苏联全国性报刊上又发表了近三百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人民日报已經将其中一部分摘要发表。

从今天开始，人民日报編輯部和红旗杂志編輯部将陸續发表文章，評論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杂志編輯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目 录

声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苏共领导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发展 人民日报編輯部 1
红旗杂志編輯部

評蘇共中央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附件一：

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意見提綱 51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廿一日）

附件二：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

会談上的声明 55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件三：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

关于解决分歧、达到團結的五項建議 59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

苏共領導同我們 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雜誌編輯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蘇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開信，已經一个多月了。蘇共領導發表這封公開信和隨後採取的一系列行動，已經把中蘇關係推向破裂的邊緣，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推到一個空前嚴重的階段。

現在，莫斯科、華盛頓、新德里、貝爾格萊德打得火熱，蘇聯報刊上連篇累牘地刊登着攻擊中國的各種奇談怪論。蘇共領導公然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公然撕毀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公然違反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聯合美帝國主義，聯合印度反動派，聯合叛徒鐵托集團，反對社會主義中國，反對

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是涉及一系列重大原則性問題的分歧。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給苏共中央的信件中，已經系統地、全面地論述了这种分歧的实质。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件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中苏两党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則的分歧，要不要馬克思列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團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團結的分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苏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究竟是怎样发展到目前这样严重地步的呢？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問題。

我們在《分歧从何而来？》（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論）这篇文章中，曾經概括地論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当时，我們对于有关这个問題的一些事实，特別是涉及苏共領導的一些重要事实，有意識地作了保留，給苏共領導留了余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說明真相，弄清是非。現在，苏共中央公开信在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这个問題上，扯了許多謊話，完全歪曲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們不得不列举一些事实來詳細地說明这个問題。

苏共中央公开信不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訴自己的党员

和人民群众。苏共领导不是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具有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采取资产阶级政客所惯用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一味地要把分歧的产生和扩大的责任，转嫁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采取诚实的态度，总是尊重事实的。只有政治上堕落了的人才靠说谎过活。

事实是最雄辩的。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 代表大会开始的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当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散布一种说法，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从一九六〇年四月我们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而引起的。这是一个天大谎言。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七一年多以前就开始了。

具体地说，这是从一九五六年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

大会开始的。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经历了一个产生、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过程。人们对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间，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勋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

主要領導人物的斯大林，創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保卫列寧主義遺產、反对列寧主義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其他資产阶级代理人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寧的关于苏維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綫。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綫，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斯大林的錯誤是應該批判的。但是，赫魯曉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

化了偉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偉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完全不是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严肃地分析和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采取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斯大林的领导“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等等。他根本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和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功绩，抹煞了斯大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功绩。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

渡”的論点。他說，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現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議会的道路”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錯誤論点，实质上是公开地修正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說，公开地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

赫魯曉夫在总结报告中，也借口世界情况已經发生“根本变化”，提出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是否繼續有效的問題，在实际上篡改了列宁的学說。

赫魯曉夫把美国政府及其首腦看作是抵抗战争势力的人，而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代表。他說，“在美国主張以战争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問題的人还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他們还繼續在对总统和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他还說，帝国主义者开始承认实力地位政策已經破产，他們中間“出現了头脑有些清醒的征象”。这就是說，美国政府及其首腦可以不代表美国壟斷資產阶级的利益，可以放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維护和平的力量了。

赫魯曉夫宣布，“我們希望在为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斗争方面，以及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同美国友好合作”。正是这种錯誤观点，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合作解决世界問題”的路綫。

赫魯曉夫歪曲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則，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

綫”。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互助合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支援，都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綫之外去了；或者是把这一切都从屬於他們的所謂“和平共处”政策了。

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系列的問題，特別是关于斯大林的問題和所謂“和平过渡”的問題，絕不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問題，而是同各国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問題。苏共领导事先毫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見，就武断地作出結論，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并且利用所謂“反对个人迷信”作为借口，粗暴地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內政，顛复他們的領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后来事实的发展，使人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共领导人背离和篡改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从上述这些錯誤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一向就有原則性的不同意見，这是苏共领导同志十分清楚的。但是，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却硬說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完全支持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硬說我們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評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轉弯”，說我們的立場是“搖擺不定”的，是“虛偽”的。

苏共领导想要一手遮天，这是办不到的。还是让事實來說話吧！

事实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談中，严肃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錯誤：

一九五六年四月，即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同志，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談話，都对斯大林問題表示了我們的意見。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接見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們有不同意見。还有若干問題，我們是不同意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接見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綫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同苏

共領導人的談話，周恩來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一日同當時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的蘇共代表團的談話，周恩來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同蘇共領導人的談話，都一再談到我們對斯大林問題的意見，批評了蘇共領導人的錯誤。這些錯誤主要是：對斯大林“完全沒有全面的分析”；蘇共領導人“缺乏自我批評”；“事先沒有同兄弟黨商量”。

關於和平過渡問題，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在同蘇共同志的內部談話中，也提出過我們的不同意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還向蘇共中央提出了一個書面的《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全面地、明確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觀點。

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在同蘇共同志的多次內部談話中，還針對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錯誤，就國際形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問題，系統地闡述了我們的觀點。

所有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苏共领导怎么可以睁着眼睛說瞎話，一笔加以抹煞呢？

苏共中央公开信企图把这些重要事实掩盖起来，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澤东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某些公开讲话，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曾經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徒劳的。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場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議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們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这两篇文章，在駁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謠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評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論点。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嗎？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繼續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偉大的革命領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嗎？

当然，有必要指出，当时我們考慮到，帝国主义和各國反动派正在利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猖狂地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为了團結对敌，为了照顾蘇共領導人的困难处境，同时，蘇共領導那时背离馬克思列寧主义还没有像后来走的那样远，我們沒有对于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錯誤进行公开的批評。当时，我們怀着滿腔热忱，还希望蘇共領導能够改正錯誤。因此，我們总是努力寻求它的积极因素，在公开場合給以适当的、必要的支持。

即使这样，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在公开讲话中，也还是着重从正面、从原則上闡明了我們对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立場。

蘇共中央公开信說，劉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全盤肯定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劉少奇同志論述了中国革命的經驗，說明了所謂“和平过渡”的道路是錯誤的，也是行不通的。

蘇共中央公开信說，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盤肯定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所謂“反对个人迷信”的做法。但是，恰恰正是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詳細論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問題，領袖和群众的相互关系問題，并且說明了我們党一貫的正确作風，这就在实际上批評了蘇共第